

# 官员更替、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

李后建 马 朔\*

**【摘要】**推动腐败的有效治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从官员治理的角度出发，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和评估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当年官员更替触发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强化企业的贿赂行为，同样地，伴随着政府管制的增加，企业的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强烈。进一步地，随着当年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由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会越来越严重。不过，随着权力转移和交接的逐步完成，企业的贿赂行为随之急剧减少，伴随着政府管制所引发的企业贿赂行为也在逐渐收敛。本研究丰富了官员治理与企业腐败行为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腐败治理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官员更替 政府管制 企业贿赂 腐败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2486 (2016) 03 - 0125 - 22

## 一、引言

作为一个有悠久集权历史的国家，中国的“政府规制”古已有之。从对货币与度量衡的大一统，到“质人”“市司”“牙行”等官方服务管理系统的出现，到对盐铁、兵器、军马等商品的垄断，再到“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国家政策的推行，中国古代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的历史可见一斑。政府管制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为解决铁路问题成立的洲际商业委员会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管制机构。在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今天，政府管制已经成为国

\* 李后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马朔，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候选人。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62004）、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6SB0031）、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农村资源市场化研究团队资助。

家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主要包含两层含义：政府管理与政府规制。一方面，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目的制定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某些行为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政府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即政府依据现有规则行使管理权（曾国安，2004）。政府管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强力手段之一，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本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和市场的不断发展，其消极影响逐渐显露，尤其是随之伴生的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管制这一词来源于对 Regulation 的翻译，其实质是管制者依照某种规则对被管制者的限制，而政府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对被管制者（企业、个人、团体等）活动的直接的、行政性的管理和监督（于立、肖兴志，2001；曾国安，2004）。一般认为，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合理的、必要的。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并非完美，时常会发生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情况，即市场的失灵。所以政府应充当市场调控者的身份，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和管制。政府管制最初源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即政府管制应服从于公共需要，为争取社会公平和福利最大化而存在。由于外部性问题，在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人的市场中，会存在某些无人愿意或无力支付的“公共物品”，如路灯、公园、铁路等，造成公共利益的流失，此时政府管制的作用就会突显出来，而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和管理“公共物品”就成为了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市场交易中，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通常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政府可以通过对交易方式、进入资格等方面的管制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危害。自然垄断理论也表明，政府管制是产生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而政府失灵、可竞争市场、市场机制、公共利益批判等理论学说表明，政府规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缺陷，但其负面作用也是相当显著的（茅铭晨，2007）。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可能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问题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张维迎，2014）。腐败总是与管制相伴而生，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是那些政府管制最严苛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管制取代了市场，贿赂取代了竞争，公众的消费者剩余被瓜分为经济租金和腐败官员的受贿所得，而市场成为了腐败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合谋游戏，政府和公众最终成为了政府管制的受害者。江艇和聂辉华（Jiang & Nie，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贿赂大幅度提升业绩，而国有企业贿赂的效果却不明显。因为贿赂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规避繁复的

政府管制，而国企本身便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无需贿赂便可以得到民营企业通过贿赂换取的“特权”。

政府管制与腐败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各学派的观点不尽一致。韦伯学派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官员的管制行为并不重要，而政府管制的形式可能才是腐败发生的原因（Brown et al., 2008）。杜瓦诺瓦（Dinissa Duvanova）（Duvanova, 2014）通过对25个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研究发现，政府管制形式比管制内容更易引发贿赂行为。尽管有部分实证研究发现管制干预与腐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Treisman, 2000），但这种影响并非线性的和绝对的。

出于对公共利益假说的质疑，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Stigler, 1971）提出了“管制俘获理论”。他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电力行业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受到管制的企业并不比不受管制的企业有更高的效率，某些政府管制甚至沦为服务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工具。公共选择学派把租金的概念引入俘获理论，从利益集团寻租和管制者创造租金、抽取租金两个方面解释了管制俘获的动机。赫尔曼（Joel S. Hellman）等（Hellman et al., 2003）将管制俘获分为两种形式：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政府俘获。前者主要指大型国有企业可能通过自身的政企关系和行业内的垄断地位，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获得某些政府管制的豁免权、资源的占有权或政策的倾斜；后者指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贿赂而得到某些规则的便利，甚至使政府改变管制的政策和力度。“俘获者”企业通常有更好的业绩、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受到的产权保护也要优于其他企业。为了获得“俘获者”的地位，发达国家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游说增加企业的影响力，而发展中国家通常更习惯于直接贿赂。阿克帕鲁瓦（Wisdom Akpalua）等（Akpalu et al., 2009）认为，政府与企业可能会在管制实施中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通常以企业的贿赂、管制的改变为代价。他们研究发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大多并未受到相应政策的限制和政府的管制。政府官员在执行管制措施时，难免受到既得利益者和资源占有者的反对与阻挠。当政府官员同意接受贿赂而放弃管制时，企业将会乐意提供一份低于规制成本的贿款，反对的声音亦随之减少。即便官员属于被动受贿者，政府管制的执行力度也会随贿款的增加而减弱。对于受贿的政府官员和行贿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双赢的交易（Akpalu et al., 2009）。

政府管制不仅是企业贿赂行为的诱因，还是左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虽然腐败问题大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但企业的贿赂行为只是特定政策制度下的次优选择，而不良的政府管制才是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经济滞后的根本原因（Jiang & Nie, 2014）。然而，即便是最优的政府管制，其实

也难免伴随腐败行为 (Acemoglu & Verdier, 2000)。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强调, 大型的国家官僚机构 (Ting, 2003)、随意的政府管制 (Kydland & Prescott, 1977) 和政府俘获 (Hellman, 1998) 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效应。此外, 根据梅翁 (Pierre - Guillaume Méon) 和威尔 (Laurent Weill) (Méon & Weill, 2010) 的论述, 低效率和繁重的国家管制会使得腐败成为改善经济效率的一种非正式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 官员所拥有的政府管制权力正是腐败滋生的源头, 不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进行根本的改革, 腐败终将难以遏制。

政府管制可以影响企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贿赂也将对政府管制产生作用, 甚至某些管制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企业或其他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贿赂等不透明的方式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 这种现象被称为“管制俘获” (李健、西宝, 2012)。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管制俘获现象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俄罗斯、欧美、东欧等经济转轨的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而美国 2008 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反映了管制俘获即使在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Baker, 2010)。赫瓦贾 (Asim Ijaz Khwaja) 和米安 (Atif Mian) (Khwaja & Mian, 2004) 对巴基斯坦 1996—2002 年存在的企业贷款扭曲现象进行研究, 发现规制俘获造成的社会损失占到了 GDP 的 0.3% 到 1.9%。卡托 (Luis A. V. Catão) 和特洛尼斯 (Marco E. Terrones) (Catao & Terrones, 2005) 基于 23 个新兴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对外汇体制的管制也与腐败有直接关系。

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为地方官员干预辖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安排, 在这种激励结构框架下, 官员的更替通常会给辖区的发展带来较为深刻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逻辑, 目前国内文献集中探讨了官员更替与辖区经济之间的关系, 包括官员更替与企业风险 (钱先航、徐业坤, 2014)、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 (何山、李后建, 2014; 陈艳艳、罗党论, 2012; 徐业坤等, 2013)、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王贤彬等, 2009) 等之间的关系。然而, 有关官员更替可能带来的政府管制问题却鲜有文献论及。这不仅造成中国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影响的正确评价缺少科学依据, 而且导致现阶段反腐战略科学化的争议无法消弭。事实上, 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体制下, 官员更替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 而且意味着新旧政策的更迭。在官员更替之际, 基层政府将会对旧政策选择性执行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 包含在新旧政策中的不同管制政策将会在执行力度上发生明显的变化, 由此引发的腐败行为也将异于往常。因此, 在官员更替的情境下, 探讨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关于

中国制造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评估了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理解和评价当前“简政放权”战略的重要意义，深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而且对于中国全面反腐战略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理论分析

### （一）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

政府管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缺陷，但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可能更甚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认为：（1）作为市场的调控者，政府无法掌握市场的全部信息，甚至相对于某些市场主体并没有信息上的相对优势，而任何在只掌握部分信息下所做之决策，其正确性都理应受到质疑。（2）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决策通常受制于某些政治形态、公众意见。当然，决策者的主观倾向也会左右政府管制的方向，甚至发生“管制俘获”，从而造成决策失误。（3）政府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缺少有效的行政问责和监督机制，非竞争性使其效率低下，存在大量的繁文缛节。（4）政府的高额管制成本通常造成财政支出的无限扩张。（5）政府官员对个人财产与政治利益的追逐，会导致一系列权力寻租问题。由于政府管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同时，无疑也会扰乱天然的市场秩序，破坏隐形的市场规则，以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具体而言，政府管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引发企业贿赂行为。

第一，政府管制会抑制市场竞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政府管制的实质都是以管制命令取代市场竞争，进而限制消费自由、阻碍企业创新、改变供求关系、影响产业自主调整（王健，2015）。此外，由于政府管制本是对市场行为的引导和规范，但市场是灵活和时刻变化的，而管制是相对死板和固定的，管制的调整很难因应市场的变换，即管制始终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样的管制无疑会严重阻碍市场自由发展和合理竞争的步伐。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市场将会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而社会资源的配置亦会达到帕累托最优，企业无法获得持久的超额利润，即不存在经济租金，也就不存在可能的寻租行为。而当竞争受到抑制时，企业间的资源配置被扭曲，成本与收益的平衡被打破，市场上出现长期存在的超额利润，理智的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图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换取政府的政策倾斜，从而取得更高的行业地位。在严重缺乏竞争的市场里，投资、研发与创新将不再重要，贿赂反而成为获得行业

优势的最佳途径。

第二，政府管制会诱发产业垄断。政府掌控着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和行政处置权，政府的管制行为很容易造成企业间信息、资源和政策的失衡，一些企业因为受到政策歧视而逐渐退出市场，而另一些企业因为政策支持获得了巨大的行业优势，成为市场的垄断者。“自然垄断理论”表明，由于某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外部经济性、固定成本较高、回报周期较长、资源较为稀缺等特点，只有一家或较少数的企业介入经营时，才会产生较大经济性，所以政府应当促成这种有利的垄断。此外，为防止垄断企业利用自身地位无限制地提升产品价格、侵害消费者权益，政府也应对垄断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但对任何企业而言，占有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都是巨大的诱惑。现实情况是，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区分自然垄断产业和非自然垄断产业，且易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而产生管制“刃锋”问题（汤吉军、郭砚莉，2012）。有许多企业都愿为获取垄断特权付出足够的“代价”，不惜以重金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而那些已经在产业内获得垄断的企业，也会想方设法地贿赂相关官员，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打击潜在的竞争企业。

第三，政府管制会赋予官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管制作作为“法律意志”的化身，通常会授予政府官员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地方官员灵活变通、因地制宜，提高管制效率。但当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对企业而言）过大时，市场将可能沦为政府官员之间博弈的工具。企业仅仅通过贿赂便可获得通过合法竞争都无法企及的行业优势，此时的“寻租投资”通常会带来远超成本的巨大收益。当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时，相应的监管系统将很难对其做出合理限制，无法指望一个缺少有效监督的政府官员凭借自身的道德情操来约束自身行为。同时，不同职位上的官员享有政府管制的权力是不同的：在同一等级和待遇下，较清廉的官员对政府管制权力的种类是没有偏好的，但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官员，可能会追求更有“利”可图的管制权力，从而出现那些更容易获得“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的岗位。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的地域差异也非常明显，所以政策很难有太高的普适性，特别是经过简政放权的改革后，许多政策的细节都交由地方政府决定。那些随意性较强、透明性较差的政策，会使官员在管制时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继而引发企业贿赂问题。

## （二）官员更替与企业贿赂

在中国“分权制”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成为对企业进行管制的主要执

行者（周黎安，2004）。对企业而言，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政企关系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更替，通常意味着新的经济政策走向。在这种情境下，本文将从官员和企业两个角度论述官员更替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

1. 官员角度：（1）由于中央相对考核机制引发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GDP的增长率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依据。所以对新任官员而言，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实施一套有别于前任官员的政策，力求改革和政策创新，以便上级领导有效地识别自己的政绩（吴建南等，2007）。但在差异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于对政策连续性的考虑，他们并不会全盘摒弃前任的管制政策。因此，官员更替后，前任官员遗留的管制政策将与新任官员实施的差异化政策形成叠加，统一性显著降低，政府管制政策凸显复杂化。显然，管制政策越复杂，由此引发的腐败问题可能越严重（崔炳善等，2002）：如果把管制和贿赂视为政企之间的一种交易，那么在新官员上任前，管制和贿赂经过长期交易，处于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即相应的管制政策和力度对应相应“价格”的企业贿赂，而一旦新官上任，政府管制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提升，企业贿赂必然也会随之增加。此外，政府官员新到任时，由于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和掌控较弱，通常希望获得有关某些特定企业的信息、态度甚至经济支持，以便顺利推行新的管制政策。此时，官员通常会对那些愿意支付贿赂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以致贿赂成为企业达成政企合谋的重要筹码。（2）在官员更替前，即将离任的官员由于去向已定，此时，辖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对自己的晋升之路有任何帮助，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秉承“中庸之道”，宁可无功但求无过，为减少风险实行一些较为平稳和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等待任期的结束。而官员更替后，新任官员为谋求早日晋升，必然会大力发展经济。在“唯GDP”的相对考核指标下，新任官员往往会“涸泽而渔”，争取在任期内取得最大的经济增速，因此，新任官员常常不顾实际情况地大力推行扩张性政策。在扩张性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会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获取贿赂。例如：以索取贿赂的方式拍卖减税名额、政府购买对象、投资额和财政补贴等。

2. 企业角度：官员更替的发生通常意味着政企关系的重新洗牌，也意味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新的政策倾向，所以对大部分企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特别是对于原来政企关系较差、被政策边缘化的企业，这可能是获得政治支持的绝佳机会，而贿赂通常便是获得这种机会的筹码。此外，官员更替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府管制的方式和力度，甚至引发直管国有企业高管的非正常变更（潘越等，2015）。这使企业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理性

企业为抢占市场先机，通常希望优先明确政策方向。此时，企业通常具有向新任官员进行贿赂的强烈动机。官员更替代表当地企业与前任官员可能存在的合谋关系彻底清零，而通过贿赂前任官员获取超额收益的权利难以继续奏效，这使得惯用贿赂获取利益的企业受到冲击，为了缓解这种冲击，这些企业迫切需与新任官员建立起利益联盟关系，从而引发对权利的“竞租”。

官员更替当年，由于管制政策复杂化、扩张性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等原因，企业贿赂会显著增加。可以预见：当官员更替完成、新一任地方政府的工作步入正轨后，企业贿赂情况会有所缓解。这是因为：（1）政策过渡期为了政策连续性和创新性而产生的复杂管制体系，逐渐演变为以新任官员推行的政策为主的管制体制，合理性与统一性不断提升，企业遭受的不必要管制逐渐减少；（2）新任官员到任一段时间后，经济、政策方针大体确定，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而且由于权利“竞租”的完成，企业通过贿赂得到较高收益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此，官员更替完成后，企业的贿赂动机会不断弱化，贿赂行为也随之收敛。

### 三、数据来源与估计模型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摘自世界银行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这项调查工作的起止时间是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旨在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质量。这项调查的内容涉及到有关企业的一系列特征，主要包括受试企业的内部经营状况和所面临的营商环境。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采用根据注册域名进行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充分考虑了企业、行业和地区间的变异。调查样本均匀分布在25个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合肥、深圳、佛山、东莞、石家庄、唐山、郑州、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烟台、成都、杭州、宁波、温州。调查的总样本为2848个，其中148家为国有独资企业，2700家为非国有独资企业。剔除“缺失值”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179个，样本的大量丢失可能会破坏原有抽样的科学性，从而影响样本的代表性，为此，我们使用其他非政治敏感的变量（例如员工接受教育程度）在整体样本和有效样本之间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变量在这两个子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知，样本的大量丢失并不会对样本的代表性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此外，为了缓解极端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本研究按照上下1%的比例对研究中所有的连续变



量进行了“缩尾”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有效样本中，所有的企业均来自于制造业。

## （二）关键变量界定

### 1. 企业贿赂

因变量企业贿赂的构建是基于问卷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公司有时需要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来‘把事情办好’。这些事情涉及到海关、税收、许可证、规章条例以及相关服务等。平均而言，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sup>①</sup>事实上，伯格（Sanford V. Berg）、迪亚比（Aboubacar Diaby）、塞尔韦斯特（Kevin Sylwester）等学者也用类似的问题来界定腐败（Berg et al., 2012; Diaby & Sylwester, 2015）。由于贿赂问题的敏感性（少量受访者可能会承认参与了贿赂行为），因此问卷中要求受访者评价“像你们这样的公司”之经验，而不是报告他们事实上遇到的腐败官员。尽管克拉克（George R. G. Clarke）（Clarke, 2011）认为当受试者以百分比的形式报告贿赂额度时，他们通常会高估贿赂水平，然而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种不实陈述的强度会在企业之间产生系统变异。

### 2. 官员更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官员的更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也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官员的重要制度逻辑。在本研究中，我们参照罗党论和余国满（2015）的定义，若2010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发生更替则赋值为2；若2010年市委书记或市长发生更替，则赋值为1；若2010年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发生更替，则赋值为0。官员更替的数据来自我们手工搜集的数据库。

### 3. 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总称，旨在纠正由于自然垄断、强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王哲、顾昕，2015）。在本研究中，我们遵照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Guriev, 2004）和张峰等（2016）的经验做法，将政府管制界定为企业在处理规则制度时所花的时间。在具体度量繁文缛节时，我们基于问卷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周内，高层管理者用于处理政府各项规制的时间比例？”，在这个问题中，高层管理者通常指经理、董事和生产或销售主管以上的管理者。政府规制则涉及到税收、海关、劳动力制度、

<sup>①</sup> 在研究中，我们删除了不愿意回答此问题的公司和回答为“我不知道”的公司。

许可证和注册等。然而，从企业层面观察和测量政府管制可能并不合理。首先，政府通常会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管制政策，而不太可能对不同的企业制定不同的管制政策。当然，尽管中央政府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管制政策，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些管制政策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执行力度（Marquis & Qian, 2014）。由此可知，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地区，管制政策可能会存在变异。其次，从企业层面度量政府管制会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这是因为，在一周内，高层管理者用于处理政府各项管制的时间比例是被试者的估算，这种估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倘若调查期间企业的高层领导（经理、董事和高管）刚好集中处理政府的各项规制时，被试者有可能会高估这一时间比例。反之，则可能会低估这一时间比例。为此，我们将这种估算偏差视为白噪音。与从企业层面度量政府管制相比，通过计算聚合在城市—行业层面的政府管制程度的平均值有助于消除白噪音，减少测量误差。

### （三）估计模型

毋庸置疑，现实中，影响企业贿赂行为的因素很多。除了本文关注的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外，不同企业和行业的特征也会使得某些企业更易遭受腐败问题的困扰。由此，控制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有制类型、融资约束和市场范围等特征变量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如此，城市层面的众多属性，包括经济水平、市场规模和教育水平等都可能影响企业的贿赂行为。因此，控制这些变量有助于捕捉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对企业贿赂造成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建立如下线性估计模型：

$$\text{Bribery}_i = \alpha_0 + \alpha_1 \text{Regulation}_{jk} + \alpha_2 \text{Turnover}_e + \beta Z_i + \text{Industry effects}_j + \text{Regional effects}_k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因变量  $\text{Bribery}_i$  刻画的是第  $i$  个企业的贿赂行为变量。 $\text{Regulation}_{jk}$  表示的是第  $j$  个地区第  $k$  个行业的政府管制。 $\text{Industry effect}$  和  $\text{Regional effects}$  分别表示企业所属行业和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表示随机扰动项。 $Z_i$  表示控制变量集，包括如下变量：

（1）企业规模：按照员工人数划分为大、中和小企业，其中大型企业员工人数为大于或等于 100 人，赋值为 3；中型企业的员工人数为大于或等于 20 人，并且小于或等于 99 人，赋值为 2；小型企业的员工人数为大于或等于 5 人，并且小于或等于 19 人，赋值为 1；（2）企业年龄：定义为 2012 年减去企业开始

运营的年份并取自然对数；(3) 所有权性质：外资股份表示外国资本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比例，而国有股份则表示国有资本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比例。所有制类型变量的引入是为了捕捉所有制效应；(4) 融资约束：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更易遭受现金流问题，而降低它们行贿的能力（Clarke & Xu, 2004）。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银行授信来体现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若企业拥有银行授信则赋值为1，否则为0；(5) 市场范围：市场范围体现了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若市场范围越广，则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越多，市场竞争将会越激烈。通常地，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利润趋近于零，由此，腐败的地方官员只能从这些企业中抽取更低的租金（Diaby & Sylwester, 2015）。在本研究中，市场范围被界定为虚拟变量，若企业产品主要在当地市场上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为0；若企业产品主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为0；若企业产品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其中企业产品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被设定为参照组；(6) 经济水平：利用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7) 市场规模：利用人口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所在城市的市场规模；(8) 教育水平：利用教育机构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所在城市的教育水平。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汇报在表1中。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企业贿赂	1 179	0	0.25	0.0020	0.0141
政府管制	1 179	0	0.0857	0.0117	0.0128
企业规模	1 179	1	3	2.0602	0.7557
企业年龄	1 179	0	125	13.3053	9.0172
外资股份	1 179	0	1	0.04547	0.1836
国有股份	1 179	0	1	0.0206	0.2246
银行信贷	1 179	0	1	0.3478	0.4765
省级市场	1 179	0	1	0.1790	0.3835
全国市场	1 179	0	1	0.7269	0.4457
官员更替	25	0	2	0.7200	0.7371
经济水平	25	2 321.2	16 872.42	6 015.9130	3 510.7890
市场规模	25	370.89	2 301.91	844.0798	379.2328
教育水平	25	3	89	32.6	25.3887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众多企业的反馈是其并未支付任何贿赂，且企业支付贿赂额度比例的最大值为 25%，故因变量是一个左截尾为 0、右截尾为 0.15 的截尾变量（缩尾处理后）。为此，我们在回归分析中主要使用 Tobit 模型。进一步地，我们估计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并允许误差在行业内部相关。表 2 报告了政府管制和官员更替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回归结果。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通过逐步纳入控制变量来观察回归系数的变化。表 2 第 1 列中政府管制和官员更替的系数都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第 2 列至第 3 列是逐步纳入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和城市层面特征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政府管制和官员更替的估计系数依然都为正，并且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水平均未发生明显的改变。第 4 列加入了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后，政府管制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而言，政府管制程度从平均值开始，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企业的贿赂比例将增加 2.49%（如表 2 第 5 列所示）。这一结果表明，政府管制负担越严重，企业进行贿赂的动机就越强烈。这与杜瓦诺瓦（Duvanova, 201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政府管制增加了官僚机制的寻租机会，同时也使得贿赂成为企业改善行政效率的一种非正式机制。因此，降低政府管制负担，将会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改善的效果，并有助于企业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

同样地，官员更替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也显著为正，具体而言，官员更替程度从平均值开始，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企业的贿赂比例将提高 0.04%（如表 2 第 5 列所示）。这意味着官员更替程度越高，企业进行贿赂的动机也越强烈，这与申宇等（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市委书记的更替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寻租费用，但企业新增的寻租费用不仅带来了正的经济回馈，还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补贴与融资额。企业通常会主动迎合新任官员，以获取新一轮经济优势。对此，本文给出的解释是，首先，官员更替会强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理性的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先机，通常需要提前向地方官员明确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此时，企业通常具有强烈的贿赂动机；其次，地方官员更替可能为企业通过贿赂等手段游说新任官员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在官员更替的当期，地方企业都会积极寻求与新任

官员建立联系，以期在新一轮的资源配置中赢得先导优势。

进一步地，我们通过绘制官员更替与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来反映在官员更替的不同程度下，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在逐渐增加。这意味着当期的官员更替是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机制。对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在中央相对考核机制下，政治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以便上级政府有效地识别自己的政绩。在推行差异化政策的过程中，地方官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全盘否决前任推行的政策。因此，现任实施的差异化政策叠加上前任推行的政策会使得这些累加的政策中所包含的管制政策迅速增加。此时，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贿赂来减少政府管制所产生的高成本。其次，在官员更替当年，即将卸任的地方官员为了保持平稳过渡，通常会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政策例如增加对企业项目审批的程序或延长审批的时间等，这显然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成本，提高了企业的贿赂额度。

表2也呈现了其他一些重要发现。首先，企业规模会弱化企业的贿赂行为，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中国，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小型企业更容易遭受更高额度的非正式支付请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面对非正式支付请求时，大型企业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来降低非正式支付的比例。银行信贷会强化企业的贿赂行为，即相对于无银行信贷的企业而言，具有银行信贷的企业支付贿赂额度的比例会提高0.18%。这一发现意味着在正式制度不健全的经济体中，银行信贷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现金流，提高了企业的贿赂支付能力。企业的市场范围会弱化企业的贿赂行为，即企业的市场范围越广，企业支付的贿赂额度比例会越小。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长期的市场分割可能是当前腐败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可能的原因是市场分割破坏了良好竞争秩序的形成，增加了市场进入壁垒，提高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寻租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企业的贿赂动机。为此，要有效地降低企业腐败行为，就必须建立统一市场，破除“条块分割”的顽疾。此外，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规模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接触到的贿赂支付请求会更少。

表2 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实证结果

	(1)	(2)	(3)	(4)	(5)
政府管制	0.6418*** [0.2176]	0.3896** [0.1517]	0.7588*** [0.2751]	0.5974** [0.2859]	0.0249** [0.0127]
官员更替	0.0177*** [0.0054]	0.0282*** [0.0077]	0.0168** [0.0063]	0.0133** [0.0061]	0.0004** [0.0002]
企业规模		-0.0169*** [0.0043]	-0.0130*** [0.0042]	-0.0136*** [0.0040]	-0.0006*** [0.0002]
企业年龄		-0.0012 [0.0055]	-0.0035 [0.0054]	-0.0031 [0.0054]	-0.0001 [0.0002]
外资股份		-0.0175 [0.0257]	-0.0343 [0.0210]	-0.0381 [0.0284]	-0.0016 [0.0011]
国有股份		0.0188 [0.0212]	0.0342* [0.0200]	0.0316 [0.0200]	0.0013 [0.0009]
银行信贷		0.0453*** [0.0084]	0.0390*** [0.0071]	0.0421*** [0.0080]	0.0018*** [0.0003]
省级市场		0.0416** [0.0178]	0.0362** [0.0160]	0.0305** [0.0150]	0.0013** [0.0006]
全国市场		0.0263* [0.0154]	0.0212 [0.0139]	0.0169 [0.0132]	0.0007 [0.0006]
经济水平			0.0152 [0.0250]	0.0152 [0.0237]	0.0006 [0.0010]
市场规模			-0.0696** [0.0352]	-0.0727** [0.0339]	-0.0030** [0.0014]
教育水平			-0.0080 [0.0086]	-0.0059 [0.0085]	-0.0002 [0.0004]
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YES
常数项	-0.1449*** [0.0118]	-0.1547*** [0.0271]	0.2234 [0.3985]	0.2459 [0.3778]	— —
样本量	1 986	1 179	1 179	1 179	1 179
伪R <sup>2</sup>	0.1055	0.3567	0.5688	0.6811	0.6811

注：\*、\*\*、\*\*\*分别表示 $p < 0.1$ 、 $p < 0.05$ 和 $p < 0.01$ ；[]内表示分别聚合在24个行业水平的稳健性标准差。以下相同，不再赘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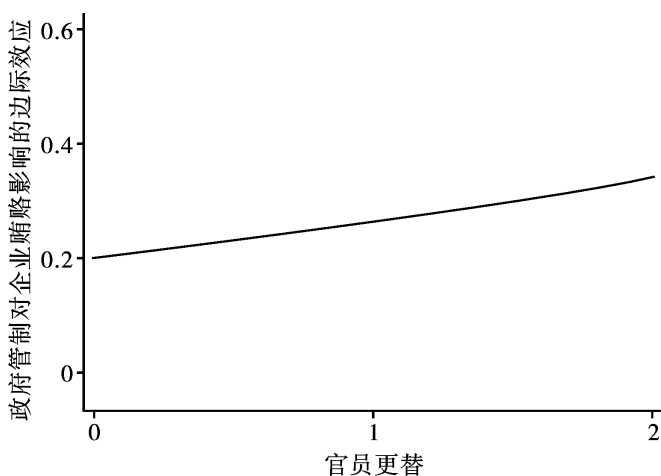


图1 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二）稳健性回归结果

### 1. 官员更替的滞后效应

以上结论是否受到官员更替滞后效应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使用滞后一期的官员更替变量，具体界定为若2009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发生更替则赋值为2；若2009年市委书记或市长发生更替，则赋值为1；若2009年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发生更替，则赋值为0。表3报告了滞后一期的官员更替与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纳入，政府管制和官员更替 $_{t-1}$ 的回归系数仍然分别为正和负，并且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水平均未发生明显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滞后一期的官员更替对企业的贿赂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期的官员更替却显著强化了企业的贿赂行为。其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在地方官员更替的当期，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通常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全盘否决前任的政策，因此，在官员更替当期，政策的连贯性会降低，而复杂性会增加，因此，在政策调整的窗口期，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贿赂来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官员更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此时建立在前任官员基础上的利益联盟关系将难以维系（潘越等，2015）。在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经济体中，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利益联盟关系，此时，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贿赂来游说新任的地方官员。其次，在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后一年，新任官员推行的新政策逐渐确定，而前任官员已经推行的政策也逐渐调整完毕，大部分政策

已经渐趋明朗。政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降低弱化了企业的贿赂动机。最后，在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后一年，新的政企关系已经建立，新一轮资源配置的对象也基本已经确立，企业贿赂的机会成本增加。

进一步，我们绘制了滞后一期的官员更替与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来反映在滞后一期官员更替的不同程度下，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随着滞后一期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在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当期的官员更替是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机制。可能的原因是，在地方官员更替后一年，前任官员的部分政策已经被废止，新的政策也已经开始推行<sup>①</sup>。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胜出，新任官员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会针对那些迎合自己政治偏好的企业放松管制，例如优先审批这些企业的相关项目，以便这些企业快速、顺利地完成任务，从而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增加筹码。由此可见，在官员更替后一年，企业通常会竞相与新任官员达成政企合谋之局面。通过完成新任官员下达的政治任务，企业通常能够享受政府授予的各种特权，从而避开各种管制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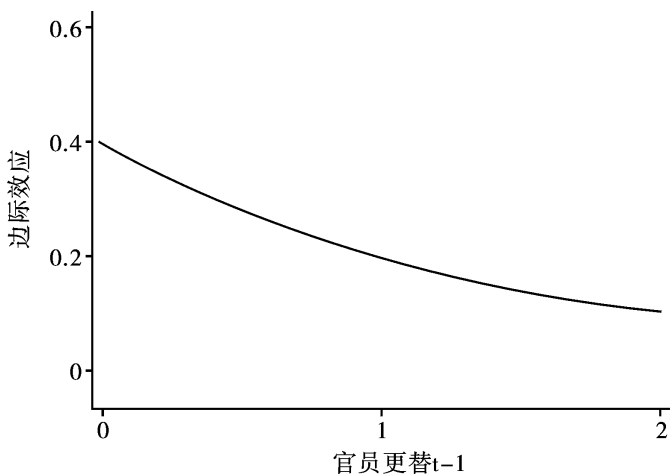


图2 官员更替<sub>t-1</sub>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sup>①</sup> 前任官员的政策所需资源已经用到极限，同时政策红利也已经耗尽，理性的新任官员通常会废止前任官员的部分政策。



表3 滞后一期的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实证结果

	(1)	(2)	(3)	(4)	(5)
政府管制	0.9587*** [0.1824]	0.9601*** [0.2289]	0.9354*** [0.2044]	0.8036*** [0.2392]	0.0335*** [0.0121]
官员更替 <sub>t-1</sub>	-0.0390*** [0.0101]	-0.0345*** [0.0113]	-0.0237* [0.0131]	-0.0250* [0.0135]	-0.0010** [0.0005]
企业规模		-0.0160*** [0.0040]	-0.0125*** [0.0041]	-0.0131*** [0.0038]	-0.0005*** [0.0002]
企业年龄		-0.0001 [0.0055]	-0.0037 [0.0051]	-0.0033 [0.0051]	-0.0001 [0.0002]
外资股份		-0.0089 [0.0265]	-0.0345 [0.0296]	-0.0385 [0.0308]	-0.0016 [0.0012]
国有股份		0.0197 [0.0230]	0.0336 [0.0222]	0.0311 [0.0220]	0.0013 [0.0010]
银行信贷		0.0408*** [0.0076]	0.0358*** [0.0061]	0.0390*** [0.0070]	0.0016*** [0.0003]
省级市场		0.0242 [0.0200]	0.0313* [0.0170]	0.0238 [0.0159]	0.0010 [0.0007]
全国市场		0.0132 [0.0153]	0.0175 [0.0139]	0.0117 [0.0134]	0.0005 [0.0006]
经济水平			0.0209 [0.0242]	0.0220 [0.0229]	0.0009 [0.0009]
市场规模			-0.0731** [0.0325]	-0.0772** [0.0311]	-0.0032** [0.0009]
教育水平			-0.0084 [0.0086]	-0.0066 [0.0084]	-0.0003 [0.0004]
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YES
常数项	-0.1265*** [0.0105]	-0.1245*** [0.0257]	0.2117 [0.3940]	0.2346 [0.3469]	— —
样本量	1 986	1 179	1 179	1 179	1 179
伪 R <sup>2</sup>	0.1282	0.2869	0.5974	0.6386	0.638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2. 政府管制的替代测量

以上结论是否受到政府管制不同测量指标或测量方法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了政府管制的替代性指标，即将政府管制细化为海关和贸易

层面的政府管制（替代指标1）、税收层面的政府管制（替代指标2）、业务授权和许可层面的政府管制（替代指标3）以及土地制度层面的政府管制（替代指标4）<sup>①</sup>，回归结果经整理后汇报在表4，Tobit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政府管制的各个替代指标对企业贿赂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地，官员更替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仍显著为正。此外，我们将上述四个替代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形成一个综合得分指标（替代指标5）来替代政府管制，回归结果依旧显示，在1%的水平上，政府管制的综合得分替代指标对企业贿赂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地，官员更替的系数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其他类型的稳健性检验，这些稳健性检验包括，（1）内生性检验：由于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分属城市和城市—行业层面的变量，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而言，它的贿赂行为通常很难撼动城市层面的官员更替和城市—行业层面的管制政策。因此，由于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严重。但是，由于影响企业贿赂的因素较多，并且大部分因素通常难以观测，这可能会遗漏重要解释变量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纳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例如企业层面的管理经验、灰色竞争等，以及宏观层面的法治质量等，相关估计结果与前文一致，说明本文关于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稳健的；（2）由于直辖市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将直辖市与其他普通城市同等看待，将可能会带来估计偏差，为此，我们将直辖市样本删除，重复前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与方向并未发生显著变化；（3）考虑到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本文将样本按照法治质量水平的高低、企业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组估计，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

<sup>①</sup> 对于海关和贸易层面的政府管制，我们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运营的制度质量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海关和贸易管制对企业当前运营的障碍有多大”进行度量。同时，企业管理层可以选择的答案为“没有障碍”“较小障碍”“一般障碍”“较大障碍”和“非常强烈的障碍”。根据这些答案，我们依次赋值为0、1、2、3、4；同样地，对于税收层面的政府管制，我们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运营的制度质量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税收行政管理对企业当前运营的障碍有多大”进行度量，同时，企业管理层可以选择的答案为“没有障碍”“较小障碍”“一般障碍”“较大障碍”和“非常强烈的障碍”。根据这些答案，我们依次赋值为0、1、2、3、4。其他指标的度量与此类似，不再赘列。此外，考虑到同一城市同一行业不同企业可能对政府管制的主观评价有明显偏差，故将同一城市同一行业不同企业对政府管制的平均值作为政府管制的度量，以减少衡量误差。

表4 官员更替、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影响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1)	(2)	(3)	(4)	(5)
官员更替	0.0097 ** [0.0045]	0.0093 * [0.0049]	0.0089 * [0.0048]	0.0111 ** [0.0049]	0.0086 * [0.0047]
替代指标 1	0.0300 ** [0.0124]				
替代指标 2		0.0170 *** [0.0064]			
替代指标 3			0.0311 *** [0.0083]		
替代指标 4				0.0138 ** [0.0068]	
替代指标 5					0.0137 *** [0.0041]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 174	1 180	1 180	1 180	1 174
伪 R <sup>2</sup>	0.6390	0.6715	0.6940	0.6671	0.6977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五、结论和政策内涵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攻坚期，反腐倡廉既是当前和今后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扫清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障碍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治理腐败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各部门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国内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政府体制和经济转型的讨论上，鲜有文献将官员更替、政府管制和企业贿赂之间的关系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权威第三方“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运营环境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官员更替、政府管制与企业贿赂之间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论表明，繁重的政府管制会引发强烈的企业贿赂行为，同样地，当年的权力转移与交接会激发企业竞相寻租的动机，引发企业的贿赂行为。更重要的，当年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导致管制政策的复杂化，强化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的积极影响。不过，随

着权力转移和交接的完成，企业寻租的动机开始弱化，贿赂行为也开始减少，同时管制政策也逐渐明朗，复杂化程度逐步降低，由此导致的企业贿赂行为也逐渐收敛。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有效降低企业贿赂，本研究认为政府各部门在反腐内容上应推动以治理结构为中心的“合规治理”向以治理机制为中心的“有效治理”转变。具体的政策内涵如下：

首先，本文研究发现，政府管制会强化腐败官员向企业抽取贿赂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繁重的政府管制可能是引发企业贿赂行为的重要根源。因此，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有效地减少政府管制。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各部门要做到简政放权，简政在于精简政府、政务，减少政府管制；放权在于改变权力结构，抑制自由裁量权。即打破政府的行政控制与干预，将市场能够管好的事情交给市场管理，政府不应插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各部门要加快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深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准入门槛，让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本文研究发现，当年的权力转移和交接会引发更加强烈的企业贿赂行为，而权力转移和交接完成后，企业寻租的动机开始弱化，贿赂行为也开始减少。这意味着在地方官员轮替交接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严格任期制，避免官员成“临时工”。地方官员的频繁更替会削弱辖区内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引发较高程度的政策执行波动，诱发地方官员执政行为的浮躁化，执政理念的短期化以及执政政绩的泡沫化等系列问题，触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有效地捕捉市场先机，引发了企业对寻租行为的热衷，导致了大量的企业贿赂。为此，中央要避免领导干部职务频繁的轮替交流，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的制度化、法治化和有序化。同时要始终贯彻人事行政的规律性，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前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尽管，本文基于政府官员权力转移和交接的逻辑框架下考察了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冀望为市场化转型中腐败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但是，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之处。

首先，企业的贿赂行为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即上一年度的贿赂情况可能会影响到本年度的贿赂比例，但限于数据结构，本文并未考虑贿赂的滞后效应。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使用追踪调查数据，并纳入贿赂的滞后效应来考察官员更替和政府管制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影响；其次，对于政府管制而言，有些政府管制可能是必要，而本文并未考虑政府管制的异质性，并且在目前的经验研究中，仍未找到一种有效度量政府管制的有效方法。考虑政府管制的异质性和有效度量仍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陈艳艳、罗党论(2012).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 经济研究, S2: 18-30.
- 崔炳善、司空泳洪、李秀峰(2002). 政府规制与腐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5: 77-83.
- 何山、李后建(2014). 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 R&D 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 产业经济研究, 4: 30-40.
- 李健、西宝(2012). 管制俘获成因的定性比较分析.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33(7): 923-928.
- 茅铭晨(2007). 政府管制理论研究综述. 管理世界, 2: 137-150.
- 罗党论、余国满(2015). 地方官员变更与地方债发行. 经济研究, 6: 131-146.
- 潘越、宁博、肖金利(2015).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6: 135-147.
- 钱先航、徐业坤(2014). 官员更替、政治身份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 经济学: 季刊, 4: 1437-1460.
- 申宇、傅立立、赵静梅(2015).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9: 37-52.
- 汤吉军、郭砚莉(2012). 沉淀成本、交易成本与政府管制方式——兼论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新方向. 中国工业经济, 12: 31-43.
- 王健(2015). 政府管制的竞争评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4: 8-16.
- 王贤彬、徐现祥、李邨(2009).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 4: 1301-1328.
- 王哲、顾昕(2015). 标尺竞争: 政府管制与购买的激励效应. 公共行政评论, 6: 9-24.
- 吴建南、马亮、杨宇谦(2007).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 管理世界, 8: 43-51.
-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2013).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管理世界, 5: 116-130.
- 于立、肖兴志(2001). 规制理论发展综述. 财经问题研究, 1: 17-24.
- 曾国安(2004). 管制、政府管制与经济管制. 经济评论, 1: 93-103.
- 张维迎(2014). 管制越多腐败越深. 资本市场, 4: 13-13.
- 张峰、黄玖立、王睿(2016). 政府管制、非正规部门与企业创新: 来自制造业的实证依据. 管理世界, 2: 95-111.
- 周黎安(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经济研究, 6: 33-40.
- 周黎安(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 7: 36-50.
- Acemoglu, D. & Verdier, T. (2000). The Choice Between Market Failures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1): 194-211.
- Akpalu, W., Eggert, H. & Vondolia, G. K. (2009). Enforcement of Exogen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ocial Disapproval and Bribery.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8(6): 940-945.
- Baker, A. (2010). Restraining Regulatory Capture? Anglo-America, Crisis Politics and Trajectories

- of Change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6(3): 647 – 663.
- Berg, S. V., Jiang, L. & Lin, C. (2012).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Corrup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Telecom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1): 22 – 43.
- Brown, J. D., Earle, J. S. & Gehlbach, S. (2008). Helping Hand or Grabbing Hand? State Bureaucracy and Privatization Effective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2): 264 – 283.
- Catao, L. A. V., Terrones, M. E. (2005). Fiscal Deficits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3): 529 – 554.
- Clarke, G. R. & Xu, L. C. (2004). Privatization,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How Characteristics of Bribe Takers and Payers Affect Bribes to Uti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9): 2067 – 2097.
- Clarke, G. R. G. (2011). How Petty is Petty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Firm Survey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39(7): 1122 – 1132.
- Diaby, A. & Sylwester, K. (2015). Corrup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Post – communist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66(C): 487 – 499.
- Duvanova, D. (2014). Economic Regulations, Red Tape, and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n Post – Communist Economies. *World Development*, 59(59): 298 – 312.
- Jiang, T. & Nie, H. (2014). The Stained China Miracle: Corruption, Regul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conomics Letters*, 123(3): 366 – 369.
- Hellman, J. S., Jones, G. & Kaufmann, D. (2003).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 751 – 773.
- Hellman, J. S. (1998).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2): 203 – 234.
- Guriev, S. (2004). Red Tape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2): 489 – 504.
- Khwaja, A. I. & Mian, A. (2004). *Corruption and Politicians: Rent – seeking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 Kydland, F. E. & Prescott, E. C.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473 – 91.
- Marquis, C. & Qian, C. (201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in China: Symbol or Subst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5(1): 127 – 148.
- Méon, P. G. & Weill, L. (2010). Does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Matter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Modelling*, 27(1): 296 – 303.
- Stigler, G.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ience*, 2(2): 3 – 21.
- Ting, M. M. (2003). A Strategic Theory of Bureaucratic Redundan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2): 274 – 292.
- Treisman, D. (2000).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3): 399 – 457.